



伊安·霍德(Ian Hodder)教授访谈录

◆ (英) 伊安·霍德(Ian Hodder)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

◆ 刘岩 (采访、整理、翻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

◆ 杨旭 (翻译、整理、校对)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编者按:伊安·霍德(Ian Hodder),著名考古学家,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后过程考古学代表人物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理论、恰塔尔胡尤克(Catalhöyük)遗址、欧洲史前史、物质文化、社会与文化的长时段变化。在斯坦福大学开设“考古学理论导论”(研究生课程)、“物:人与物关系的考古学”(研究生课程)、“恰塔尔胡尤克与新石器时代考古”(本科生课程)。

1968-1971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攻读史前考古方向获学士学位。1971-1975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考古学中的空间分析”。1974-1977年任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考古系讲师。1977-1999年在剑桥大学考古系任助理讲师、讲师(1981年)、史前学研究副教授(1990年)、教授(1996-1999年)。1999年至今,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99-2009年任斯坦福大学考古中心联合主任、主任。从2002年起,任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唐勒维家族(Dunlevie Family)教授。

1971年,荣获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戈登·柴尔德奖(Gordon Childe Prize)。1990-2001年任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院士(Fellow of Darwin College, Cambridge)。1995年获瑞典古物学会(Swedish Society of Antiquaries)颁发的奥斯卡·蒙特留斯(Oscar Montelius)勋章。1996年至今,任英国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2002年荣获土耳其文化部颁发的国家奖,以奖励其对土耳其考古所作出的突出贡献。2005-2006任古根海姆院士(Guggenheim Fellow)。2007年至今,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荣誉教授。2009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尔(Bristol)大学自然科学荣誉博士。同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德雷克赛尔奖章(Drexel Medal)及伦敦皇家人类学学会(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London)颁发的赫胥黎纪念勋章(Huxley Memorial Medal)。2011年获荷兰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荣誉博士学位。在1974-1976年、1980-1981年、1982-1983年,前后三次对肯尼亚物质文化进行民族学调查。1981-1990年,主持英格兰汉敦汉姆(Haddenham)遗址的发掘。1993年至今,主持土耳其恰塔尔胡尤克遗址发掘,在发掘中使用了反身(reflexive)法,成为后过程考古学方法的范例。

霍德的主要著作有:《考古学空间分析》(Spatial Analysis in Archaeology, Hodder and Orton 1976)、《象征符号实践: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Symbols in Action: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ies of Material Culture, Hodder 1982)、《现存的过去:给考古学家的人类学导论》(The Present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for Archaeologists, Hodder 1982)、《阅读过去:考古学阐释的主要方法》(Reading the Past: 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 Hodder and Hutson 1986、1991、2003)、《欧洲的驯化: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结构与偶然性》(The Domestication of Europe: Structure and Contingency in Neolithic Societies, Hodder 1990)、《考古学过程:导论》(The Archaeological Process: An Introduction, Hodder 1999)、《豹的故事:揭示恰塔尔胡尤克的秘密》(The Leopard's Tale: Revealing the Mysteries of Catalhöyük, Hodder 2006)、《纠缠:人与物关系的考古学》(Entangl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Things, Hodder 2012)。

2014年9月-2015年9月,刘岩作为国家公派留学生在斯坦福大学考古中心交流访学。其间,旁听了霍德教授的“考古学理论导论”、“物:人与物关系的考古学”、“恰塔尔胡尤克与新石器时代考古”三门课程。在课程结束后,刘岩于2015年6月9日中午在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对霍德教授进行了专访。内容包括后过程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霍德教授的经历、与宾福德教授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发展及中西考古学走向等。本文即根据此次采访录音整理而成,由于时间有限,事先设计的问题没能完成,本文的上篇为霍德教授访谈的内容,下篇是他对未完成问题的书面回复

*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资助编号:201404920022



上篇

刘岩:霍德教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在这次访谈中我想跟您谈谈您有关后过程考古学的观点、您个人的一些理论思考以及您个人的一些学术经历。我想,通过这次对话,能够让中国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您的思想。在中国,考古学界一般是通过您的著作《阅读过去》(Hodder and Hutson 2003)以及布鲁斯·特里格(Bruce Trigger)的著作《考古学思想史》(Trigger 2006)了解到您的。虽然您的著作《阅读过去》已经有了中译本,但大部分中国学者仅仅通过一、两本书还不能够完全透彻理解您的思想。而且在中国,后过程考古学也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所以,我们就首先以后过程考古学来开始我们的访谈吧。

伊安:好的。

第一部分

后过程考古学与人类观念的作用

刘岩:据我所知,《阅读过去》一书的第一版(Hodder and Hutson 1986)出版的时候,后过程考古学的影响力还很有限。1970年代,您当时是过程考古学家,主要兴趣点是运用空间分析的方法寻找考古遗存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您为何提出后过程考古学?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对过程考古学进行批判?这是否与您在《象征符号实践》(Symbols in Action, Hodder 1982a)一书提到的、此前您所做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有关?

伊安:我提出后过程考古学的原因很多。首先,当我用过程考古学方法进行空间分析时,我发现分析的结果难以令人满意。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社会进程留下的考古遗存往往会呈现相同的空间分布模式(Hodder and Orton 1976)。当你去观察这些分布模式时会发现,它们看起来非常相似。但实际上,这些模式是由不同的社会进程产生的。所以我认为,如果你想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过程,你需要做更多、更深入的情境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倡导情境分析法的原因,这与我过程考古学的批判、对空间分析背后的社会过程所做的缜密思考密切相关。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第二,如你所言,我在《象征符号实践》(Hodder 1982a)中提到民族学研究对我影响很大,是这方面的研究让我意识到,人类行为与物质文化之间的关联并不简单,原因在于这一关联受到意义与能动性(agency)的作用。同时,跨文化比较的过程考古学方法是有问题的,它不足以让人们理解特殊的文化背景,因此也就无法让人们真正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

第三,在1980年代的美国考古学中,欧美考古学家坚持的进化论视角的人类学研究已经被人类学家摒弃。很多人类学家已抛弃了实证主义,并开始运用社会学理论。这些社会学理论受法国及英美理论家的影响,倡导一种更为情境化的(contextual)、历史化的方法,对语言和意义尤为感兴趣。想借此大展身手的生态的、环境的进化论思想同已经走向另一方向的人类学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我认为,试图让考古学同人类学重新进行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点,也最重要的是,当时考古学采用的是一种被误解了的实证主义观点,人们误以为科学是保持中立的,是客观的。与此同时,发生的很多政治运动、如性别与女权主义研究、各地的土著群体都认为,仅有科学方法是不够的。他们都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对权利和表征(representation)非常关注。最明显的是,考古学家在谈论过去的女性时也存在很大偏见。所以,考古学家需要对世界各地不同群体的利益作出更加积极的回应。考古学需要一种更为反身的(reflexive)、更具历史的、更具自我批判的方法。

刘岩:从您的《象征与结构考古学》(Symbolic and Structural Archaeology, Hodder 1982b)一书了解到,当您在剑桥大学任教时,您身边有很多杰出的学生,你们一起探讨新的理论,一起批判过程考古学。这也让我想起在过程考古学的早期,宾福德教授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他身边也有很多优秀的学生(Binford and Renfrew 1987),而且这些学生对过程考古学的兴起作出了很大贡献。我想您的学生也是这样的,他们也是后过程考古学的先驱者。我的问题是,你们当时都讨论些什么?您在和学生的讨论中学到了什么?

伊安:当时的确有很多学生,他们大部分都在《象征与结构考古学》(Hodder 1982b)和另一本名

为《意识形态、权力与史前史》(Ideology, Power and Prehistory, Miller and Tilley 1984) 的书中发表各自的文章。这些学生有丹尼尔·米勒 (Daniel Miller)、迈克尔·尚克斯 (Michael Shanks)、克里斯·蒂利 (Chris Tilley)、亨利艾娜·摩尔 (Henrietta Moore)、麦克·帕克·皮尔逊 (Mike Parker Pearson) 等。当时有很多学生,他们都才华出众,是他们引领我走向后过程考古学,而不是在其他领域徘徊。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中有些人接受过专业的人类学训练,但不是美国的人类学。他们接受的是更关注历史的、更关注能动性及意义的新人类学。影响我们的主要人物是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他对当时的人类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当时也在剑桥大学任教。我有几个学生,如麦克·帕克·皮尔逊,开始关注吉登斯,而且吉登斯也过来同大家一起交流学术。所以我们同人类学关系非常密切。吉登斯是一位社会学家,这也使得我们的理论框架更加广博。也有其他一些人,如埃德温·阿登纳 (Edwin Ardener) 他也和我们进行交流。不知我是否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并且让你对那些学生和他们的阅读的材料有了大致了解?

刘岩:你们从谈话中都学习到了什么?

伊安:我们主要获知了有关能动性的概念,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还有对结构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及有关语言、文本、意义及围绕后结构主义的争论。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也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我的学生们对很多颇具启发性的思想都很感兴趣。

刘岩:从您的《阅读过去》(Hodder and Hutson 2003)一书我了解到,物质文化是在具体的情境中由意义所构建的。本质上说,人的观念是物质文化的根源,并决定物质文化的意义。您认为在每一个社会群体中都是这样的吗?您对功能与适应在决定器物的形制和风格上所起的作用怎么看?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观念是实用主义的,即所有东西都与实际的行为效率有关,这样的社会存在吗?换而言之,您对形制、功能和风格三者之间的关系怎么看?

伊安:这是个大问题。如你所言,在考古学中,人们对风格的作用及风格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大争议。在我看,这样的争议并不是很有帮助。因

为像形制或风格这样的概念是描述性的,是从外部视角对器物进行的描述。如果人们对社会实践更感兴趣,他会更关注能动性理论,能动性涉及到人们以特殊的方式去制作器物。我认为,区分风格与功能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区分也没有任何益处。这是因为,所有的风格都有功能,而且所有的功能都带有风格。两者的区别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分不清在物质材料中,与社会有关的功能及与适应有关的功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两者往往是一回事。过去,人们常常认为风格中的某些东西与功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是以实践理论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并且你也对能动性有兴趣的话,就会非常容易地发现,风格的所有层面都是有功能的。我认为,说某件东西只有象征含义实际上是对社会过程的一种误解。对我来说,从实践理论和能动性的角度讲,区分风格与功能已经不合时宜 (no longer relevant) 了。

刘岩:您认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都会受到人类观念的影响吗?

伊安:是的。但自 1980—1990 年代以来,我们需要对有关意义的观点格外小心,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有许多人类赋予实物或行为的意义,并非人们有主动、有意 (conscious) 去赋予的意义,而是体现的 (embodied)、发生在实践过程中的意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本体论思考,他们赋予这个世界的意义也不同。所以,在某些存在万物有灵观念的社会,人们认为,实物和动物可以起到人的作用。人赋予物以意义的方式很多,对意义的知觉也有不同层次。人们已经对将物质文化当成文本看待的观点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因为人们更倾向于认为,物有很多不同层面的意义,很多意义都与实践相关。所以,在我看来,将过去看做可以解读的文本已经没有什么益处。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的能动性总是有意义的,这一观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刘岩:我发现,在您的书中多次出现“体现 (embodied)”一词。您能阐释一下这个词的含义吗?

伊安:好的。我以皮埃尔·布迪厄讨论北非的卡拜尔 (Kabyle) 社会为例加以说明。在卡拜尔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男人应该像长矛一样昂首挺胸。当地人觉得,昂首挺胸是一种优良品质,是正直的象征,是群体中优秀成员的表现。然而,人们却认为女人不应该直视他人,应该把腰弯下,低头向下看。

这就是意义可以被体现的一个典型例证。要想成为一个男人,一个优秀的男人,一个正直的男人,你必须挺直腰杆。但作为一个女人,则应卑躬屈膝(deferential)要同男人在行为上有所区别,要低头向下看。这样,意义和社会等级差异就在人的身体上体现了。

刘岩:所以,“体现”的意思是身体可以作为一种载体来表达社会规则,亦或说是关于社会中那些规范身体应该如何行动的社会规则,以及其背后的社会观念,作为载体的身体是可以表达出内容的,对吗?

伊安:是的,你说的很对。举例来说,我们此时正在谈话,你直视我的眼睛,我们的眼睛可以直接对视彼此。但是在中世纪的一些社会,如果你过来和我说话,是不可以直视我的眼睛的。你应当低头看地面,不能抬头看我。另外,在一些社会中,像我们之前谈到的卡拜尔社会,女人是不得与他人有目光交流的。所以,你现在可以看着我的眼睛跟我交流,这一行为本身就表达了一种现代社会的观念,即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可以平等地同对方交谈。

刘岩:如果考古材料非常有限,或者我们没有发现图像、圣象、雕塑等特殊遗存,我们是否有可能了解某一史前社会的意识形态?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做研究,对史前考古学家来说太难了。因为并不是所有遗址都像恰塔尔胡尤克那样,可以发现如此之多的象征符号信息。我想,民族考古学或许能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些许帮助。但是,您在《现存的过去》(The Present Past, Hodder 1982c)一书中,表达了对类比方法的一些担心,那么您认为我们如何才能更多地发现史前社会的社会背景?

伊安:类比方法非常重要。但在《现存的过去》(Hodder 1982c)一书中,我想要说明的是应该有一种更具关联性的类比(relational analogy)方法,换言之,类比方法与周围环境和背景(context)之间的关联非常密切。大量例证表明,很多考古学家过于简单随意地使用类比法,他们并未认真思考自己所使用的类比例子是否能彼此相关联。同时,我仍然认为,我们拥有的材料越丰富,我们越能有效地使用类比方法。如果我们发掘的遗址除了些石器之外,其它任何东西都没发现,那么我们就很难研究清楚遗址的背景。但考古学家总是非常善于从贫乏的材料中提取丰富的、详细的信息。举例说,近年来,考

古学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如考古遗传学、古DNA、同位素、新的测年技术、石器和陶器的残留物分析,所有方法都表明,我们现在有能力从材料贫乏的遗址中获取种类更为丰富的信息以及更为多重的证据线索。但据我所知,在中国,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考古学材料的丰富程度堪称惊人。所以你们更有能力去重建古代的社会背景信息,因为你们拥有更为丰富的材料数据,拥有连续性非常强的文化历史,并且拥有可以追溯到非常早期的文献资料加以研究。通过以上那些方法,我们应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更富有关联性的手段,这种手段可以试着将所有不同种类的材料组织起来。但我们还是需要类比的方法,这不仅仅是假设古今存在连续性,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通过与其他社会比较的过程中,发现那些其它的视角是否是相互关联的。

刘岩:那么,您认为后过程考古学批判的是过程考古学的本体论、认识论,而没有批判其方法吗?

伊安:不是的,后过程考古学也批评过程考古学方法。过程考古学很关注普遍规律(overgeneralization)。在美国,有很多人,包括学生,他们跑到一个考古遗址,仅仅通过采样的方式挖了一点点材料,就想以此来验证假说。我认为这种做法很糟糕,因为它没有充分考虑到考古遗址的复杂性,没有考虑到遗址在不同地层深度上的差异性,也没有考虑不同种类材料之间的关系等等。我非常反对这种偏重采样和验证假说的考古学方法。我想,我们需要一种更关注情境的、更具批判精神来审视材料来源的考古学方法,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及,即要审视那些用来研究的考古材料产生的过程。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考古材料的情境,即我们从什么地方、在哪里得到了这些材料样品。我坚定地认为,一个更加注重情境的考古学方法能够指导大型的考古队进行更加细腻、发掘时间更长的、更加深入的研究。我真的觉得,这样要比人员稀少的小型考古队到遗址上挖那么一点点材料要好得多。

刘岩:这就是为什么您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发掘了20多年的原因。

伊安:是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把恰塔尔胡尤克遗址挖得太快,将会得出很多错误结论。梅拉特(Mellaart)1960年代对恰塔尔胡尤克的发掘就是如此。他发掘得非常快,只发掘了很短时间。当然,

他得到了一些正确的结果,但他把很多东西都搞错了。

刘岩:马修·约翰逊(Mathew Johnson)曾说,并没有“后过程考古学家”这个说法,他还列举了后过程考古学的8种观点(Johnson 1999)。布鲁斯·崔格尔(Trigger 2006)则将后过程考古学概括为三个阶段,即对过程考古学的批判阶段、结构主义考古学阶段和基于现象学方法的景观考古阶段。我们知道,后过程考古学是非常多元的,那么,您怎样概括后过程考古学的发展过程及主要的理论发展趋势?

伊安: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后过程考古学非常非常多元。当然,后过程考古学可以简单概括为:一种将社会理论引入考古学中的考古学。尽管社会理论本身已经非常多样并且非常难于概括,但仍可以对后过程考古学的发展做出归纳:关于后过程考古学的主要转变,我前面已经提到,那就是从早期受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影响,到开始关注文本,进而转向对物质性(materiality)的关注,以及转向对物的参与(engagement with things),如体现(embodiment)和景观(landscape)的关注。后过程考古学存在明显的转向,即对作为语言的意义关注转到对现实生活世界(lived world)中的意义和一切存在(being)的关注。我希望这是一个非常明朗的趋势,但是,当代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有很多。我觉得目前很难确切说清楚谁是后过程考古学家,谁是过程考古学家,因为二者的理论界线非常模糊。举例来说,拥有各种各样不同研究兴趣的人群都开始使用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方法。过程考古学家也尝试着吸收能动性思想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物质性(Knappett 2012)。对各种考古学派的考古学家而言,对自身所属的学派的身份认同,变得越来越模糊。

刘岩:对意义和文本的关注是后过程考古学早期阶段的特征,对吗?

伊安:是的。后过程考古学的早期阶段有时也被称作阐释考古学(interpretive archaeology)。

刘岩:我们谈谈后过程考古学的方法论吧。我知道,最基本的方法是反身(reflexive)的方法。您能简要介绍这个方法吗?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您发掘恰塔尔胡尤克遗址之前就有这种方法吗?

伊安:并非如此。这一方法是在发掘恰塔尔胡

尤克遗址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在发掘的过程中我尝试开发这个方法。这么做的原因在我看来似乎是这样的,虽然人们已经转向后过程考古学理论,但却仍然采用过程考古学的方法。而过程考古学的方法是一种非常客观主义的方法,对我来讲,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看来有必要发展一些对理论变化更敏感的方法。考古学的反身方法是受到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的反身方法影响,这一方法不仅是从考古学内部发展出来的。反身方法中有些关键性的思想极重要。其中的主要思想是,人们应该对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很多例子可以说明,一些人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就像男性会以一个男性视角来书写历史,而殖民地考古学家则会以殖民地的视角书写过去。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人们没有对科学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反思。这就是反身考古学中最重要思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观点,或者可以说是两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第一点,我将之称为“手铲边缘的考古学”(archaeology at the trowel's edge)或“手铲边缘的阐释”(interpretation at the trowel's edge)。在实证主义或过程主义框架下,过去人们常常认为,考古材料的收集仅仅是一个机械的、描述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你只需要描述自己见到了什么。但事实上,大部分考古学家都知道,当我们发掘时,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发掘过程本身往往包涵很多非常复杂情况需要我们解释。因此,试图在发掘的同时就尽可能多地发现各种信息、尽可能多地进行各种阐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考古发掘本身具有破坏性,我们永远无法再回到已经发掘过的层位与遗址中对某些遗存进行核对。我们再也无法对遗存进行全面的再阐释,因为那些与之相关的背景信息已经不见了。你所能做的最好办法就是在进行发掘时,最大限度地提供更多信息,做更多的记录。我们在发掘时(在手铲边缘)记录的信息越多,后人所能做的各种不同阐释也就越多。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将其称作“对记录过程的记录”。通常情况下,考古学家仅仅会记录那些他们发现的遗存,但是我们还需要了解他们为何这样记录,以及当他们做记录时,心里想些什么。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层面的记录,用来解释或告诉大家,记录者在做记录时的内心想法。举例说,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考古人员会以表

格形式做最初层面的记录,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会把每天的挖掘过程以及所想的记在田野日记中,我们甚至还会拍摄一些考古人员在挖掘、思考或做记录时的录像。这些信息提供给除了那些基本记录形式之外的另一种层面的记录方式

刘岩:近些年来,还有哪些后过程考古学的具体方法被发展起来或被成功地运用?

伊安:最近我们刚刚完成一部名为《拼装恰塔尔胡尤克》(Assembling catalhöyük, Hodder and Marciniak 2015)的书。“拼装”(assembling)的思想相当有趣。这个思想同样来自社会科学、人类学及其它学科。但它与考古学中组合(asmblage)的思想能够产生相当多共鸣。考古学家可以利用不同种类的考古材料,像陶器、石器、动物骨骼、植物等。在恰塔尔胡尤克,我们共收集了35种不同材料,有土壤材料、化学分析材料、残留物分析材料、植硅石材料等。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材料整合在一起。在很多考古项目中,人们不大强调对材料的整合。而是将不同种类的材料送到相关专家那里,然后由专家们各自将自己所做的分析写成单独的分析报告。但是我真正想要做的是让所有人把手中的材料拼装整合在一起,从而真正地形成一个团队。作为一个团队,不同背景下的人们就需要相互协作,并且需要与团队里的所有人对话。这样,考古队中的每个人都会试图沿着特定方向来处理材料。然后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依赖网络关系的社会过程。网络关系的思想也很有意思。以恰塔尔胡尤克遗址为例,不同群体喜欢彼此在一起工作。当某一群人头脑中产生某种灵感时,他们就会尝试将不同种类的材料放到一起来构建自己的观点。但在另一群人、另一个网络关系里,大家会说我们不喜欢那样的观点,那他们就会以另一种方式使用证据。他们会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拼装证据。这和乐高玩具非常相似,你知道,乐高是一种儿童玩具。在玩乐高玩具时,你有很多块积木,但你却可以用相同的积木拼装出不同的雕塑或不同物体。恰塔尔胡尤克遗址不同的考古队也是这样,他们手中拥有的材料都一样(都是相同、可以共享的数据库,采访者注),但他们却以不同的方式将相同的材料拼装在一起。

刘岩:拼装的思想就是将不同种类的材料与证据放在一起、用不同方法组装整合,目的是想看看这些材料以何种方式组合会为我们呈现出怎样

的知识和信息?

伊安:是的。但关键之处在于,每个人手中拥有的材料都一样,平等共享。然后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将它们拼装在一起。

刘岩:不同的人用相同的材料拼装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是吗?

伊安:是的。但关键在于要用不同的拼装方法。

刘岩:人们在拼装材料之前不能有任何的想法或假说吗?

伊安:可以有。人们可以事先有假说,你可以说他们在检验假说。但我不认为拼装是一种检验假说的行为。与其说拼装是一种检验,不如说拼装更是一种……

刘岩:一种归纳?

伊安:是的,拼装是一种归纳,但要更进一步……它是一种社会过程。人们彼此交流,可以相互竞争,然后产生不同的想法。我想,将拼装看成是一种客观的、对科学假说的检验的做法是不正确的。拼装更像是一种很多人参与的社会过程。

刘岩:拼装这一概念让我想起了拉图尔(Latour)的书《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Latour 1986)。书中,拉图尔在实验室里观察并记录科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相比较而言,考古学家也是知识的生产者,但拼装的过程与实验室中的科学过程是不同的。

伊安:是的,你说的很对。

刘岩: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拼装的过程,反映出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学者,在产生知识过程中是有能动性的。知识本身是带有人的意志和观念的,知识本身也包含了人在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参与过程。而且,从能动性与实践理论的视角看,知识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客观与实证。从本质上讲,知识是一种社会的、经验性的实践产物。

伊安:是的,就是这样。

刘岩:让我们聊聊理论与方法的关系。看上去,在后过程考古学中,理论要比方法先出现,您赞同这一观点吗?在实践中,您是如何针对某一具体理论去发展后过程考古方法的呢?我的意思是,反身的方法是在后过程考古学理论之后出现的,那您是如何根据您所了解到的某一理论去探索与之相关的方法呢?

伊安:这与过程考古学很相似,首先是进行理论争论,之后发展出中程理论,中程理论更侧重方法层面。我想你也可以认为,这对后过程考古学来说同样成立。即后过程考古学刚开始非常理论化,之后则更加侧重方法。

刘岩:是的,我也有同感。

伊安:我也不知道理论和方法是否总是这样。我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刘岩:是的。我还有个问题是,您是如何根据某种理论思考来发展具体方法的,您如何将您的理论付诸实践?

伊安:在我看,考古学家实际做的,同过程考古学所倡导的发现普遍规律与机制的方法是分离的。就过程考古学思想而言,它倡导的是首先提出假说,然后用材料加以检验。在实践中,这种方法就是在获取规律性知识。但这种获取规律性知识的方法同样受到当时日渐兴盛的合同考古(contract archaeology)的影响,即在发掘中所使用的方法要尽可能地快捷、高效。对我而言,那些自认为存在某种客观的、不受社会过程影响的方法,同所有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我的意思是,倘若你接受了科学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过程这个观点的话,那么你要知道,这样的观点就不会出现在过程考古学方法中了。所以,对我而言,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让考古学方法更具社会性、更具批判性、更以社会为基础。而我们所发展出的新方法正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我们同样受到了具有科学实践性的民族志,以及社会科学的影响。我想回答你的是,应该努力做到让你的理论与方法保持一致。你必须确保你所使用的方法不与你的理论观点相矛盾。

刘岩:您能概括一下后过程考古学所取得的成就吗?您觉得哪些成就最重要?

伊安:对我而言,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让考古学多与社会相联系(socially relevant)、多参与社会现实问题(socially engaged)。我发现,当人们与我交谈时,他们经常对我说,他们想让考古学多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多多参与对当代社会问题的解决。如今,不论你是谈性别考古、女权主义考古,还是谈论后殖民地(postcolonial)考古、本土考古(indigenous archaeology),还是谈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都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发出自

己的声音(multivocality),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社群考古(community archaeology)中来,也会有更多团体和社群参与。在我看,所有的这些进步都是最珍贵的。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进步都受到了后过程考古学影响。但我坚信,后过程考古的确对这些进步有所帮助和推动,即便还有其他因素促成了这些进步。如美国的社群考古就受到了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原住民运动的强烈影响。但后过程考古和本土考古融合的很好。对我来说,这一进步最为重要。我认为,反身的方法同样也很重要,尽管它并未像我所期望的那样有影响力。我想,这是由于合同考古本身的巨大局限性,以及考古学自身财政等因素造成的。但反身方法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我和其他几位学者在《古物》(Antiquity)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展示了反身方法如何同现代数字技术相结合(Berggren et al. 2015)。

刘岩:是有关3D技术的那篇吗?

伊安:是的,3D还有一些其它的技术。那篇文章是讲人们如何在田野考古中应用平板电脑等技术,进而如何真正在手铲边缘阐释材料。

刘岩:后过程考古还有其它成就吗?

伊安:在我看,当代考古学所探讨的问题范围更大了,思想和理论视野也更宽广了。我认为这很重要。这些视野更加宽广的探讨让考古学家能更多地参与到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讨论。举例说,在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系,正是因为后过程考古学的存在,才让系里的考古学家同文化人类学家相处融洽,才让他们之间可以相互对话、相互了解。在这里,文化人类学同考古学关注的很多问题是一样的,如权力与能动性、意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物质性、文化遗产等。对我来说,考古学能在社会科学中视野更为宽广的讨论中作些贡献,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事。

刘岩:在您眼中,后过程考古学还有哪些不足?换句话说,您对后过程考古学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

伊安:我想,最主要的担忧可能还是来自反身的、情境的方法与相对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很多人都看到了一种危机,即考古学似乎变成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任何他们想编造故事的场所。我自己也对英国考古所取得的一些进

展持非常批评的态度。在我看,在英国考古学中,似乎可以不加批判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到材料之上,而并不思考究竟自己的观点是否适合手里的材料。在某些方面,考古学同相对主义之间产生了一种轻浮的、未经认真思考的暧昧关系(flirtation),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似乎什么都可以不被控制地发生,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说他们想说的东西。我认为这相当危险。这意味着考古学的阐释非常容易受到权力操控——受到那些对过去阐释掌握话语权的人的操控。这种不加批判的相对主义方法让人们们对后过程考古产生了抵触,会觉得后过程考古学缺少科学性,等等。我已尽力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的发掘中让大家知道,你可以持后过程主义观点,同时也可以很科学。在我看,并非后过程考古学排斥科学。实际上我非常希望通过参与社会事务、承担社会责任而让后过程考古学更加的科学。然而,由于人们认为后过程考古学不科学,所以产生了非常多的关于后过程考古学的负面反应。这一点以美国考古学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美国考古学界,分析哲学的视角更浓。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美国考古学已经脱离了文化人类学的主流趋势。

刘岩:您认为将来会出现后-后过程考古学吗?这种新的范式将会怎样?从考古学史看,考古学理论似乎总是在科学与人文、物质与思维、自然与文化、社会与个人之间来回摇摆。您认为未来的新范式会再次侧重于功能主义吗?

伊安:我真的觉得现如今有关过程与后过程的争论已不像从前那般激烈了。我的意思是,1990年代或2000年代早期,人们对此还会争论不休。但现在不会这样,很少有人说自己是后过程主义者还是过程主义者。但另一方面,你也会发现,现如今,受社会学理论影响的考古学家同受新达尔文主义等生物学理论影响的考古学家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些新达尔文主义者或新进化论者可能不会说自己是过程主义,但他们的立场中带有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因素,这跟过程主义非常相似。那些研究文化遗产、冲突过后的调节(post-conflict reconciliation)及能动性的学者也不会称自己为后过程主义,但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科学非常感兴趣。所以你可以继续保留以前的划分,但人们可能不会再使用这些曾经使用的词汇了。一种十分确定的情况是,当下的美国考古学又重新回到了一种更倾向于

自然科学的状态,人文色彩越来越淡化,并且受到了生物学、新进化论、进化心理学及认知科学等理论的强烈影响,或许欧洲考古学也是这样。所以,在我看来,考古学很明显地从人文、社会科学阵营又回到了自然科学阵营。

刘岩: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之间的界线较以前更模糊了,对吗?

伊安:我想是这样的。但你仍然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

第二部分

个人经历与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

刘岩:接下来的几个问题是有关您的个人经历与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在巴尔特(Balter)的《女神与公牛》(The Goddess and the Bull)(Balter 2005)一书中,我了解到,您在少年时曾有一段在新加坡的经历。那么,东方文化曾经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如果有,东方文化对您的学术思想有什么影响?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现后过程考古学中的一些思想,如拒绝主观、客观的对立,跟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十分相似,尽管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更强调天的作用,对人的能动性很少提及,但二者其实都是与笛卡尔的二元论相对立的。

伊安:在新加坡时我还很小。由于太年幼,所以中国思想和文化还没有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但在新加坡的那段日子给我留下了十分快乐的回忆。我在那里度过了四年光阴,还记得那些极其美妙的节日,尤其是水上的龙舟,还有绚丽的烟火,太美了。当时我只是很热爱这种文化,那种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文化。那段记忆非常美好。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经常去东亚看看的原因。在世界版图中,我热爱那片土地。但学术上所受影响是在我年龄更大一些的时候发生的。当我在英国读高中和大学时,我阅读了一些与佛教和印度教相关的书籍。你知道,其实很多西方学者在学术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国思想和哲学的影响。

刘岩:是啊。所以后过程考古学的思想应该在中国更容易被接受。但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情况因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显得较为复杂。由于考古学发展历程、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中国的政治经济进程等因素,这些都让中国考古学在理论上几乎处于

真空状态,人们往往对逻辑演绎推理的思维方式及西方考古学思想难以接受。事实上,东、西方思想并非完全水火不相容。比如有很多学者认为,美国19世纪文学和哲学中的超验主义思想似乎就受到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梭罗的《瓦尔登湖》(Walden, Thoreau 1910)是一部超验主义的经典著作。作者隐居湖畔,与大自然为邻。这部著作所体现出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谋而合,其作品似乎透露出一些东方式的哲思。此外,后现代主义思潮为了摆脱笛卡尔的二元论——这个现代性思想的根源,也曾尝试吸收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些因素^①。哲学家海德格尔尝试从东方哲学中寻找解决人类困境的方法。我认为,后过程考古学就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产生的,后过程考古学中应该可以看到某些中国哲学的身影。

自从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一直在试图学习西方、尝试从西方思想寻找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钥匙,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被贬低了。尽管中国考古学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生存,但它还是有保守的一面。当然,这或许是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但纵观历史,中国考古学本身就是在西方的极大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或许中国考古学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即将中、西方思想结合起来,去探索人与物的本质。抑或,这才是中西方考古学都应该努力去探寻的一条路。

伊安:你说的这些都很对。在我看,中国考古学可以通过探索中国的哲学与思想,发展出一个受中国思想而非西方思想影响的考古学,以此对世界考古学作出重要贡献。若是这样的话,那将非常激动人心,我非常期待见证这个时刻。

刘岩:在考古学和哲学上,您分别受到了哪些人的影响?

伊安:当我在伦敦读书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对我影响最大。我一直觉得他是20世纪最最伟大的考古学家,我在很多不同方面都非常钦佩他。他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接受的都是柴尔德式的考古训练,尽管与之相矛盾的是,那时我也受到罗宾·柯林伍德(Robin Collingwood)^②的很大影响。接下来在剑桥读书时,大卫·克拉克(David Clark)对我影响很大,此外,我还受到了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 Clark)

等人的影响。此后,布鲁斯·崔格尔对我影响非常大。影响我的不仅仅是他的思想,还有他总是乐于另辟蹊径的做事方法。他并不只是说别人说过的话,而总是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尽管当时所有人都强调人类学的重要性。他也同样受到柴尔德的巨大影响。

刘岩:您认为一个学者的性格会对他的学术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吗?因为路易斯·宾福德给大家的印象是他很喜欢与人争论(Binford and Renfrew 1987; Binford 2002; Binford and Sabloff 1998; O'Brien et al. 2007)。在我看,您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人。巴尔特在《女神与公牛》(Balter 2005)一书中描写到,“身材细长、高高的他戴着一副眼镜,隐藏在那副眼镜背后的,其实是一个十分腼腆又缺乏安全感的灵魂。”我知道,巴尔特所描述的是那个父母刚刚离异的名叫霍德的孩子。而且从其它有关您的访谈录中,我看到了一个更喜欢去问问题、挑战自我、阅读哲学著作、进行理论思考的霍德教授(Hodder, Karlsson and Olsen 2008; Rogasch 2014)。我在听您课时,对此深有体会。我发现您非常包容他人,可以接受不同的思想。您认为,您的这些性格对您的后过程考古思想有影响吗?

伊安:我想也许是这样。尽管有人说我非常乐于和宾福德一争高下!其实我更关注的是学习知识和改变自己的思想,我喜欢跟能彼此交换思想的人一起聊天、一起做研究、相互学习。在我看,做学问就是要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停地向前迈进。我不喜欢在思想上固步自封,不喜欢在某种思想上停滞不前。

刘岩:您认为一个学者自身的知识背景会影响或限制他的学术思想吗?我们知道,路易斯·宾福德有着生物学背景,所以他更关注生态适应。那您呢?我想您应该更复杂一些,因为您在成为后过程考古学之前曾是一位过程主义者。

伊安:上高中时,我就开始学习一些古典课程——拉丁文、希腊文和古代史。在欧洲的高校,考古学往往同历史学和古典研究关系密切。所以我打下了非常深厚的人文学科背景。在伦敦上大学时,我获得的是一个名叫“史前史及人类环境”的学位,这个学位很大程度上是有关古环境重建的。所以,我有着自然环境科学及人文科学的双重背景。

刘岩:您和路易斯·宾福德关系怎样?你们之间

的交流多吗?据我所知,在1980年代末,宾福德来剑桥大学讲学,您的学生曾经当面批评过他(Balter 2005)。那以后,你们之间还有其他交流吗?

伊安:是的,我们有过多次交往。我们曾经一起去参加学术会议,一起在会上讨论问题。他来过剑桥大学很多次,他在位于阿尔伯克基的新墨西哥大学执教时,我去拜访过他并在他家留宿。他的家在乡村,而且非常漂亮,他很慷慨好客。在他家的那段日子,他像伯父般的慈祥待我,非常和善,尽管在学术上我们彼此有很大分歧。我非常尊敬他,因为他对考古的热爱与执着。他想要弄明白考古学究竟是什么,考古学研究该怎样做,正因如此,我非常尊敬他。尽管在我看,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但他对考古学的投入与贡献是令人钦佩的。就个人而言,他对我非常友好、和善。

刘岩:您来到斯坦福大学后有怎样的感受?我觉得欧洲考古学与美国考古学之间的差别一定很大。您对此怎么看?您如何看美国的科学考古学与过程考古学?

伊安:美国考古学给我的最主要感受是,它太自相矛盾了。我来到美国后才发现,美国考古学中的考古科学相当缺乏,这让我十分吃惊。我的意思是,在英国,很多大学的考古系都有受过专门训练的考古科学家。举例说,他们中有的会做细致的同位素分析、有的会做微形态分析、有的会做古DNA分析等。很多大学的考古系都有技术非常专业的人才,都有人专门负责从各种自然科学基金那里获取研究经费进行高水准的分析研究。这种情况在美国则相对罕见,一部分原因是美国政府对考古学的拨款相对较少,部分原因是因为考古学设在人类学系之下。我非常赞同考古学家应该同文化人类学家进行学术对话,同时我也认为,将考古学设在人类学系并非明智之举,它限制了考古学沿着自然科学方向发展的能力。我认为,考古学应与人类学分开,要建立起自己的基础设施体系,拥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获取自己独立的研究经费。

刘岩:所以考古学就应该是考古学(而不是其他学科)?

伊安:是的,考古学就应当是考古学。正如大卫·克拉克所言,考古学是考古学且只能是考古学(archaeology is archaeology is archaeology)。这句话说得很对。

刘岩:在您看来,正是因为美国考古学设在人类学系,而且得不到足够的经费资助,所以才没办法做细致的研究?这是否也解释了之前您说过的,在美国,过程考古学家们只是通过挖一点点材料就来检验假说?您的意思是否是说,如果美国的考古学能够得到足够经费,可能就不会以这种更倾向于过程考古的、更人类学的方式从事研究了,对吗?在我看,美国人类学背景下的考古学有着自身的社会背景,因为美国远没有欧洲那样厚重的历史,狩猎采集社会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或许是这些原因让美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式很难同旧大陆一样。

伊安:是的,我想这是原因中的一部分。后过程考古学思想、理论对美国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历史考古学影响更为深远。当涉及到历史时期的研究时,仅仅靠环境适应是没办法解释所有问题的。美国考古中有关狩猎采集者的比例很大,对这样的遗址,从人对生态因素的适应角度就相对容易解释。

刘岩:美国的经历让您的学术思想有所改变吗?您在《纠葛》(Entangled, Hodder 2012a)一书中非常关注运用考古科学方法来研究“物”,这与您在美国的经历有关吗?

伊安:近年来我试图关注美国当代考古学的主要理论趋势。举例说,我阅读了很多关于行为考古(behavioral archaeology)、人类行为生态学(human behavioral ecology)、最优化模型(least cost optimization models)、理性选择模型(rational choice model)的书。这些方法在欧洲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但我努力学习它们、理解它们。还有新进化论(neo-evolutionary)的思想。我最近的文章受这些思想和著作的影响很大,尽管我并不赞同它们,因为它们考虑的变量太少。

第三部分

恰塔尔胡尤克遗址与后过程考古学实践

刘岩:谈谈您的田野发掘——恰塔尔胡尤克遗址吧。您是想在这个遗址中把后过程考古学付诸实践,并探索后过程考古学的方法,对吗?

伊安:是的,在之前的关于反身方法的讨论中我们已提及这一点。

刘岩:您觉得在发掘恰塔尔胡尤克遗址时所使用的的方法怎样?这些方法已经足够完美以致于成熟

到可以在其它的遗址推广吗?换句话说,您对自己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上所作的后过程考古学实践满意吗?我从该遗址的田野发掘报告得知,您在实践中所使用的方法有一定缺陷,您认为这些缺陷应该如何克服?

伊安:我们经历了一段相当困难的实践过程。因为你不能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应用这些理论,而需要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将其付诸实践。在现实世界中,总有各种各样历史的或社会的复杂因素,我们不能对这些漠视不理。举例说,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由于学术考古和合同考古之间的隔阂,有些理念很难被引入。为解决这一局面,我们曾做了很多努力。一些理念并未像我想象的那样被成功地应用。如我之前所言,由于合同考古的绝对主导地位、以及相当严格的时间安排和非常有限的经费等因素,这些方法并未如我预想的那样完整地得到应用。

刘岩:您知不知道,还有哪些遗址在发掘过程中使用过后过程考古学方法?

伊安:你的意思是哪些遗址用到了反身方法吗?

刘岩:是的。

伊安:我还没有做过这方面调查。据我所知,阿萨·伯格伦(Asa Berggren)将恰塔尔胡尤克遗址所使用的反身方法同瑞典合同考古中所使用的反身方法作了对比(Berggren 2001, 2009)。英国也作了很多反身方法的试验。还有人认为,美国的社群考古与反身思想之间有许多相似的共同点。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确有很多相似特征。

刘岩: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在我看,后过程考古之所以可以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得到实践,是因为这个遗址拥有很多与人类意识相关的遗物,并且拥有明显的历史延续证据。您认为是这样的吗?换句话说,您认为后过程考古只适合那些仪式与意识遗存非常丰富的遗址吗?

伊安:我想后过程考古的方法可以应用到任何地方。如果你拥有的遗存种类十分丰富,应用起来会更容易,并不一定非要仪式遗存、象征符号遗存,后过程考古学方法的核心思想是把这些不同种类的遗存证据结合起来进行阐释。我之前说过,如果你在遗址上只发现了石器,应用后过程方法就相当困难。如果你拥有各种类型遗址的丰富信息,用

后过程或反身方法会相对容易。

第四部分 纠葛理论

刘岩:谈谈您的纠葛(entangled)理论吧。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理论是在您的那本《豹的故事》(The Leopard's Tale, Hodder 2006)一书中。请问这一理论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促使您发展出这一理论?

伊安:我想这一理论主要是通过发掘恰塔尔胡尤克遗址发展出来的。在这个遗址我非常惊异于一件事,即在那里想要寻找物与物之间的各种物质关联非常容易。在我看,需要有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恰塔尔胡尤克,就是将它看成是一个由诸多人与物相互纠缠而形成的恰塔尔胡尤克。考古学家总是以自上而下的(from the top and looking down)的方式,通过寻找关于社会等级、不同群体或是宗教的线索来理解新石器时代。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高层次的抽象理论开始的。鉴于人们在恰塔尔胡尤克所能看到的信息最主要的就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努力让自己的房屋屹立不倒,努力与洪水抗争,制造各式泥砖、选择在哪儿畜牧等。对我来说,我有着非常棒的途径去接触恰塔尔胡尤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我发现,这些不同种类的实践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你改变了某一样东西,其它的东西也将随着发生改变。物与物之间以一种错综复杂的方式纠缠在一起。这让我觉得,或许生活中每天唯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种错综复杂的日常纠葛。另一些宏大主题,如社会等级、动植物驯化、社会群体、宗教等,都是这些琐碎的日常纠葛的产物。我认为,正是由于恰塔尔胡尤克遗址拥有材料的丰富性,以及把这些材料拼合在一起所做的努力,才产生了纠葛理论。与此同时,这个理论的产生还受到其他理论家,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⑬、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⑭、尼古拉斯·托马斯(Nicholas Thomas)^⑮等学者的影响。

刘岩:您在《纠葛》(Entangled, Hodder 2012a)一书中提到最近社会科学中有种思考的趋向影响了您,即“重新回到物”。能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思想吗?

伊安: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理论不同,“重新回到物”这一思想倡导的是一种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

理论,将人看做人与物之间关系网络中的一部分,或像拉图尔(Latour 2005)所言,将人看做是人与非人中的一部分。我认为,“重新回到物”主要体现了一个思想上的转变,即从以人为中心到人仅仅是诸多复杂事物关系中的一部分。在我看,“重新回到物”这一思想在当下得以流行的原因在于,如今人们发现自己身处很多自身无法掌控的大规模过程中,如全球气候变暖。这不再是我们能控制的。城市的构建本身就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在我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正身处一个由自己建构的世界中,但在某种程度上,人又被自己建构的世界所支配。当下,这种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非常有吸引力。新兴的数字技术也再一次让人感到自己只是宏大网络世界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云网络自身成为主宰者,而人只是云网络中微小的一部分。我认为,有很多种途径可以让当下的人们感受到自己同物之间的纠葛。同时,人们也察觉到这种纠葛越来越不是人所能控制的。

下篇

刘岩:对称人类学与对称考古学(symmetrical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Olsen 2012)也与这些思想有关吧?

伊安:是的,对称考古学与这些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还是有着本质区别。尤其是,我认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对称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依附关系(dependency),一方总是主宰着另一方(物主宰着人,或人主宰着物)。物将人牢牢拴住,而人也尝试去驯服并主宰物。人与物之间总有一股悬而未决的张力。

刘岩: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本体论思想从主、客体的二元对立(笛卡尔二元论)转向主客体的统一(或许可以称之为互动论)。在您看来,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我们知道,笛卡尔二元论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这是一种现代思想。那么,您认为主、客体统一的互动论这一本体论或世界观与古人的思想很相似吗?如果是这样,我想持这种观点的后过程考古学也是一种进步。因为考古学家是通过模仿古人的世界观来研究他们留下的物质遗存。

伊安:对笛卡尔二元论的大规模反对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毫无疑问,对小规模社会的研究是这股反对风潮的影响之一。这些社会

的本体论与我们的非常不同。人类学家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Viveiros de Castro)^⑥和菲利普·德科拉(Philippe Descola)^⑦的相关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我认为,开始思考非西方社会的世界观是一大进步,而且毫无疑问,这也是后过程考古学的一个目标。

刘岩:您认为纠葛理论受到了复杂性科学的影响吗?

伊安:当然。举例说,复杂的、非决定论式的因果关系、涌现的现象(emergent phenomena)及历史特殊论都来自复杂性科学。

刘岩:就其本质而言,纠葛理论在方法论上属于一种网络分析吗?

伊安:在我看,网络分析在探索纠葛理论的某些方面很有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杂志》(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将刊登一篇我与安格斯·摩尔(Angus Mol)合著的有关网络分析文章(Hodder and Mol, 2015)。我认为,研究人与物纠葛的其它方法也是需要的,而叙事性记述(narrative accounts)或许是能够全面展现纠葛的复杂性的最好方法。

刘岩:我对《纠葛》一书中图 9.2 这幅纠葛关系图很感兴趣(如图一)。能介绍一下这幅图是如何生成的吗?您在将人与物之间的依赖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图表化时,是如何界定关系中各个结点并将各种属性定义成变量的?

伊安:在纠葛及网络研究中,结点的界定往往非常困难。在我看,你需要问清楚自己,这些节点与你所研究的某一种纠葛的种类是否相关。举个例子,如果你要研究有关仪式的纠葛,一件出土于自家的骨镞或许就不是一个相关的结点。如果你想研究的是动物及产品的纠葛,这件骨镞就可以是一个相关的结点。

刘岩:您在书中说过,随着纠葛在规模和复杂程度方面的增加,其变化速度也随之加快。您给的例子是土耳其及中东农业的产生。这是一个大空间尺度的问题,是一种定性的描述。当我们在研究小尺度问题时,如何通过图示方式将不同时间跨度下的纠葛规模与复杂程度进行量化比较呢?举例来说,我想用纠葛理论去解释为何某一地区的房屋式样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在不同阶段,纠葛的复杂程度很难进行比较,因为各个时期的考古材料的完整程度不具有可比性,可能不同时期的考古材料规模与分辨率差异很大。某一时期材料的分辨率很高,另一时期的分辨率却

进化论的、实证主义的、以及行为考古的方法。但近年来,不同(地区)的考古学理论在不断取长补短,呈现出互相融合的趋势。并不存在一个主流范式,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范式去发展自己的观点,并且不会局限在过程或后过程的考古阵营。

刘岩:我们聊聊您的《当代考古学理论》(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 Hodder 2012b)这本书吧。在编撰这本书的过程中您是如何选择理论词条的?您觉得这些理论能代表当代考古学理论趋势吗?如何平衡理论的多样性与主流理论两者间的关系呢?

伊安:我必须承认做这些选择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今天再让我编这本书,我可能会选择截然不同的理论主题。理论考古学的整体格局总是在不断变化,并且总是和新型科技相对话,如同位素研究、古DNA分析和贝叶斯统计等。

刘岩:我们知道,您的这本理论著作在2012年出了第二版。您在这一版的内容上做了很多改动^⑧。您怎样觉察近些年来理论的发展?都发现了些什么?在这两版中,主要的理论都与后过程考古学有关。这是不是说后过程考古学理论更为丰富了?或者说过程考古学不如后过程考古学那样关注理论?而主要关注方法论?

伊安: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让我再编第三版,结果将截然不同。在编写第二版时,我以为我所选的主题代表了西方英语国家考古学的主流趋向。但我之前也说过,最近美国考古学对进化论的关注有所增加,如生态位构建理论(niche construction theory)。再出新版时,我会在这方面给予更多关注。

刘岩:《当代考古学理论》一书两版的时间间隔差了10年。第二版到第三版的间隔时间会更短些吗?我觉得当代考古学理论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很多流行理论不久就成了明日黄花。

伊安:我同意你的看法。理论发展的步伐的确是呈加速度的状态发展。年轻学者也很有必要为编写这样一部著作贡献一份力量啊!

刘岩:聊聊考古学在社会中的角色吧。您认为考古学的社会职能是什么?我们知道,布鲁斯·崔格尔将考古学分为民族主义考古、帝国主义考古和殖民主义考古(Trigger 1984)。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考古学的社会职能有所差异?

伊安:尽管考古学的多样性有所增多,后殖民地考古、社群考古还有本土考古都有了很大发展,就全球范围的考古学来讲,无政府背景下的考古也有了大规模的发展,但崔格尔的贡献仍然非常重

要。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像中东文化遗产的破坏,在这种状况下,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还有冲突过后,南非和卢旺达也开始重视文化遗产。

刘岩:中国曾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思想一直影响中国的考古学。中国文明的起源一直都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被列为国家项目,国家给予资金支持。在您看,民族主义下的考古学实践起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伊安:将考古学与民族主义相联系这一做法曾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因为这往往会导致少数民族的边缘化,也会抹去他们的历史和史前史。我希望中国考古不要落入这样的圈套。

刘岩:在您看来,考古学的作用是什么?是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丰富我们的科学知识?还是能够参与到当地事务中并丰富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或是其他?

伊安:考古学的终极目标、也是基本目标,是让人去探索人类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

刘岩:您认为科学考古与人文考古的划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下去吗?

伊安:这两者或许是考古学最基本的差异,很难完全消除。我也不认为消除它们的差异是个明智的做法。或许让它们相互批判、相互监督是必要的。在我看,将科学过于普遍化及过度关注内在的特殊性(inward-looking specificity)都相当危险。

刘岩:2012年您曾来中国讲学,中国考古学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伊安:我去过中国两次,真的让我印象深刻的。的确,中国的考古遗址太棒了,文化遗产的丰富程度让人难以置信。我对中国考古工作的范围、田野发掘规模以及非常周密的方法印象深刻。同时,国家博物馆和各个地区的博物馆,以及中国对考古学和文化遗产所投入的大量资金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刘岩:我想,您应该会从不同渠道了解到中国考古的状况。中国考古学特别关注材料,认为任何结论的得出都必须以材料为基础,这或许与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传统有关。20世纪早期,中国老一辈考古学家继承了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⑨的思想,对考古材料给予极大关注,这也成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传统(陈洪波,2011)。考古学被设置在历史学之下。文化历

史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要范式。中国考古学家习惯于从考古材料中得出观点,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换言之,中国考古学家习惯归纳法而非假说—演绎法。中国考古学界对考古科学方法非常乐于接受,但对理论思考比较抵触。这也是世界考古学多样性的一种表现吗?您对中国考古学的这种状况有何感想?

伊安:我经常说,考古学应该同历史学紧密相连,我们应该使用情境的方法,并以对考古出土材料的深思熟虑为基础。我很高兴这些重要的东西都在中国考古学上体现了出来。但另一方面,中国考古学并未在“社会与文化是如何发展与演变的”这一国际性课题上作出太多贡献,这其实是件非常令人遗憾和羞愧的事。在我看,中国考古学丰富的文化序列将会帮助世界其它地区的考古学家对很多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如农业适应、城市化、人口迁徙,以及一些理论问题,如纠缠、物质性及本体论等。而且,中国早期文化的独特性将会让全球考古学家更好地理解人类是如何以各种方式构建自己的生活及生存环境。

刘岩:您认为中国考古学还有哪些不足?在您心中,中国考古学应该是怎样的?中国考古学怎样才能取得进步?

伊安:我并不觉得我对中国考古学的了解程度已达到可以给出一些批评性建议的地步——我更愿意从中国考古学中学到更多。我唯一的批评性建议就是刚才所说的,如果中国考古学家无法参与到世界考古学的理论讨论之中,那太让人遗憾了,也将是世界考古学的损失。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中国考古学家到国外参与发掘。这将有助于不同国家的学者进行思想交流与经验交流。

刘岩:您有再来中国的计划吗?

伊安:我很想去,但近来还没有出访的计划。

刘岩:假设您将给一所中国大学的考古系研究生讲授一门课程,您想讲些什么?后过程考古学、纠缠理论、当代考古学理论,还是恰塔尔胡尤克遗址?

伊安:所有都有可能,但我最想做的是让同学们参与我新提出的纠缠理论,并让大家看看,怎样用这一理论来解释诸如农业起源这类重要事件的。

刘岩:如果中国开始实践后过程考古学,应该从哪里入手?

伊安: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找到能让考古学与社会相关联的方法,让当地的群体参与到考古发掘中来,去理解他们自身的历史。中国考古学可以去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看看中国考古学是怎样

融入并且参与到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中去的。我想这这将是一个十分让人期待的进步。这样,中国考古学的视角将会与西方的迥然不同。如果某种考古学理论是以中国的社会及历史理论、而不是以西方的理论为基础,那将多么令人兴奋啊!

刘岩:最后,您能展望一下考古学和文化遗产研究的未来吗?您认为未来的考古学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伊安:如今的西方考古学越来越关注“大数据”,重视数据的积累,并运用现代的分析技术去理解长时段、大尺度的趋势。当然,西方考古学在过去五、六十年中积累了海量的材料,现在是到了从这些材料中探索些规律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将这些材料同古DNA分析及其他自然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那么,我想这将开启一个令人激动的考古学新纪元。在文化遗产方面,谁可以拥有、掌控文化遗产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很多国家来说,文化遗产旅游业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收益来源。越来越多的人把考古学和文化遗产看成一个可以摆脱贫困的朝阳产业。我把这个看作是当今考古学要面对的最大挑战——考古学能否发挥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呢?几个世纪以来,考古学扮演的都是不起眼的旁观者角色。它的作用微不足道。如今,很多社会群体和国家都将考古学及文化遗产看作是推进现代化、增加收入、战胜贫困及摆脱边缘化的一种途径。我希望考古学能不负众望,做到这些,在社会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刘岩:谢谢您,霍德教授。欢迎您有机会再来中国。

后记

当某种陌生的事物还没有被人所接受和熟知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觉得它高深莫测,遥不可及。但是,一旦我们开始近距离地感知它、接触它,就会发现之前的神秘感原来只是一种无知状态下的恐惧与偏见。我对后过程考古学的认识过程就大抵是这样的。隔岸观火不如身临其境。经过旁听霍德教授的课程以及同他的交流,我了解到了一个更为形象、更为真实的后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给人的感觉一直很神秘、很抽象、并且非常理论化。而实际上,后过程考古学关注的正是人的本质,人的社会性,是真正意义上的“透物见人”。与动物不同,人的本质在于人具有思想、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一方面,人的生产、生活依赖于物质、依赖于自然,另一方面,人又会以物质、以自然为媒介,主动构建社会关系、构建自己的生活世

界。因此,在理论上,后过程考古学以丰富的社会理论为依托,秉承着主、客体统一的观点。在方法与实践上,反身的方法实际上是在反思研究中的偏见,并让更多不同知识背景、不同立场的人,包括遗址所在地的群众参与到学者的研究之中。并且,后过程考古学更具现实关怀,它试图参与到当代社会问题的解决中,让考古学更具社会性与现实性。与之前的看法不同,后过程考古学同过程考古学相比,实际上更依赖考古材料,它对材料质量与分辨率的要求更高。因此,后过程考古学更需要考古科学的参与与多学科研究的辅助,以从考古材料中提取更多的信息。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同时,霍德教授广博的知识背景,雄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底,还有他不断进行理论思考与探索、敢于挑战自我的精神、包容的学术态度都是值得每一位考古人学习的。在如何发展中国的考古学理论上,霍德教授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认为我们应该从中国自身的社会与历史理论中汲取营养,将中国考古学建立在中国的社会理论之上,而不是一直跟在西方理论的后边。因此我想,中国考古学首先要更加严谨且规范地获取考古材料,对考古材料进行更加精细化的研究;其次,要对理论做更多的探索,学习、理解西方理论的同时取长补短,使之更契合中国考古学自身的社会背景;还要更多地参与到国际重大学术问题的探讨中,对世界考古学献出一份力;还要注意避免走向相对主义,保持研究的科学性,限制主观性。上述仅是我自己在做完这次采访之后的一点拙见,用反身方法观点来看,这些建议也是需要实践中、在互动中不断进行反思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想,中国考古学需要的正是多元的话语,大家共同献言献策,百家争鸣,才能推动中国考古学的不断进步。

(刘岩)

注释:

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1954-):英国人类学家,后过程考古学代表人物之一。现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当代物质文化、人与物的关系、消费关系等。代表作有:《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1987)、《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1998)、《东西》(Stuff)(2010)等。

迈克尔·尚克斯(Michael Shanks)(1959-):英国考古学家,后过程考古学代表人物之一。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系教授。主要研究古典考古及考古学理论。代表作有:《重建考古学》(Re-constructing Archaeology)(1987)、《社会理论与考古学》(Social Theory and Archaeology)(1987)、《剧场/考古学》(Theatre/Archaeology)(2001)、《考古学的想象力》(The Archaeological Imagination)(2012)等。

克里斯·蒂利(Chris Tilley):英国考古学家,后过程考古学代表人物之一。现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主要贡献是将景观方法引入考古学中,开创了景观考古学。代

表作有:《景观现象学:地点、路径与纪念性建筑》(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 Places, Paths and Monuments)(1997)、《巨石阵的物质性:景观现象学的探索》(The Materiality of Stone: Explorations in Landscape Phenomenology)(2004)。

亨利艾娜·摩尔(Henrietta Moore)(1957-):英国女权主义社会人类学家,现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全球繁荣研究所(Institute for Global Prosperity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主任。主要研究全球化、性别、社会转型、自我想象与民主政治决策的关系等。代表作有:《空间、文本与性别:肯尼亚马拉科维特部落的人类学研究》(Space, Text and Gender: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Marakwet of Kenya)(1983)、《女权主义人类学》(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1988)等。

麦克·帕克·皮尔逊(Mike Parker Pearson)(1957-):英国考古学家,现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史前巨石阵、墓葬考古等。代表作有:《不列颠青铜时代》(Bronze Age Britain)(1993)、《死亡与墓葬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Death and Burial)(1999)等。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创立了很多颇具影响力的概念,如惯习(habitus)、场域(field)、象征暴力(violence symbolique)等。后过程考古学的很多概念、如能动性(agency)、实践(practice)、反身性(reflexive)等都来自布迪厄的影响。其代表作有:《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法文版书名为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1984)、《反思社会学的邀请》(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中译本名为《实践与反思》)(1992)。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社会学家,以“结构化理论”最富影响力,他认为社会结构不仅制约个人行动,而且还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中介,个人行动既维持着社会结构,又改变着社会结构,这一理论也影响到后过程考古学。其代表作有:《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对阐释社会学的积极批判》(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1976)、《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1986)等。

埃德温·阿登纳(Edwin Ardener)(1927-1987):英国社会考古学家,主要学术贡献是性别研究,提出女性是“静默的群体”理论。认为女性的声音之所以没被听见,是因为统治阶级对她们的声音听而未闻。他发现人类学研究中了对女性的忽视,民族志研究也是由男性设计的,但他们却对自身的偏见毫无觉察。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理论家,主要思想为权力及其与知识的关系。代表作有:《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等。

霍德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系列田野报告集中的一册列出有关反身方法的12条探索性策略(Hodder 2000)。现将其列出,以供读者对反身方法作进一步了解:a.在发掘过程中,每1、2天,实验室分析人员要到访遗址发掘区了解发掘情况。b.虽然很多考古方法都附带承认考古材料本身也带有理论色彩(theory-ladenness),但这些方法都假设考古材料是客观且严肃的。c.很多考古学方法还有个特征,它们都假定考古材料具有不证自明(self-evident)的性质。d.实验室分析人员到访遗址发掘区的另一个目的是尽可能快地将自己的分析结果反馈给田野发掘人员。e.一个整合的、可以流动共享的数据库是将考古项目中不同参与者联系在一起的最根本途径。f.用视频对考古发掘过程进行记录,同样可以达到反思的目的。g.为达到反思与自我批判的目的,人们需要在理论意识(theoretical awareness)上投入大量精力。h.考古学家需亲自绘制自己发掘建筑的平面图(plan)、素描图(drawing)、模型图。i.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古队前来恰塔尔胡尤克遗址发掘,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发掘区域。

此外,霍德还在报告中列出了恰塔尔胡尤克遗址有关反身方法的四个主题(Hodder 2000)。a.反身性(reflexivity)。反身性的意思是,对考古学假说的结果以及不同群体(包括其他考古学家及非考古学群体)参与到考古过程的行为进行反思。b.关联性(relationality)与背景性(contextuality)。意谓试图将考古发现知识产生的特定背景相联系。c.互动性(interactivity)。意思是在人们进行考古学阐释的过程中,要为人们提供可以对阐释进行质疑和批判的途径。d.多元话语性(multivocality)。意谓不同群体对过去的兴趣往往是相冲突的,他们希望以不同方式参与到考古学中,所以需要为不同话语的产生提供途径。

总之,可以将反身方法形容为一种可以打破并质疑分类、界线的非对性(non-dichotomous)思想(Hodder 2000)。实际上,后过程考古学的反身方法与布迪厄社会学中的反身性(reflexivity)思想十分接近。布迪厄的反身性思想认为,社会学家在做研究时,要不断反思自己所持有的视角、研究的内在逻辑可能产生影响,这可能对事实真相造成扭曲并产生偏见。所以“反身性”又可以理解为研究者对自己所做研究的反思。

①在后现代社会,由于现代性给人类带来战争等社会问题,导致人们对现代科学持消极态度,并且开始批判现代性思想。如尼采的名言“上帝已死”、斯宾格勒(Spengler)的经典名著《西方的没落》等。

②罗宾·柯林伍德(Robin Collingwood)(1889-1943):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业余画家,倡导唯心主义哲学,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都有所贡献。代表作有:《自传》(Autobiography)(1939)、《自然的观念》(The Idea of Nature)(1945)、《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1946)等。

⑬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科学家。主要兴趣点为对科学与技术的研究。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的主要倡导者之一。ANT理论认为,网络中的行动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没有中心,没有主、客体对立,行动者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承认、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代表作有:《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1986)、《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1993)等。

⑭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1955-):英国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主要研究包括令现代性发生的殖民地社会,中东的物质与技术政治等。现阶段主要研究政治同物质与技术联系的方式。代表作有:《殖民埃及》(Colonising Egypt)(1991)、《现代性的问题》(Questions of Modernity)(2000)等。

⑮尼古拉斯·托马斯(Nicholas Thomas)(1960-):澳大利亚人类学家。现为剑桥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主要研究太平洋地区自欧洲殖民以来的历史与艺术。代表作有:《纠缠的实物》(Entangled Objects)(1991)、《南太平洋群岛:视觉、人工制品、历史》(Oceania: Visions, Artifacts, Histories)(1997)、《发现:库克船长的航行》(Discoveries: the Voyages of Captain Cook)(2003)等。

⑯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Viveiros de Castro)(1951-):巴西人类学家。代表作有:《从敌人的视角:一个亚马逊社会的人性与神性》(From the Enemy's Point of View: Humanity and Divinity in an Amazonian Society)(1992)、《亚马逊:民族学与当地历史》(Amazônia: etnologia e história indígena)(1993)等。

⑰菲利普·德科拉(Philippe Descola)(1949-):法国人类学家。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列夫·斯特劳斯,主要研究亚马逊地区土著群体。代表作有:《微光的长矛:亚马逊丛林中的生与死》(The Spears of Twilight: Life and Death in the Amazon Jungle)(1996)等。

⑱新的变化和新增条目包括:达尔文文化进化;人类行为生态学(human behavior ecology);复杂系统与考古学;物质性;对称考古学;遗产;后殖民地考古学(post-colonial archaeology);本土考古(indigenous archaeology)。

⑲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近代史学之父。兰克学派创始人,认为历史研究必须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要以客观的态度撰写历史。强调客观材料的使用,认为“历史要书写得要像过去发生之事一样真实”。

李水城审定于北京蓝旗营蜗居

2015年12月28日